

#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 难忘的亲历

# 吴天明：30年前，他开始讲述“黄土地”传奇

● 本报记者 张悦



电影《老井》剧照

旺泉其实在某些方面与他很像。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找孙旺泉时很费心力，跑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演员，都觉得不理想。而张艺谋、吴天明本来是请他做摄影师的，后来觉得他的气质靠近孙旺泉，有一股犷劲，而且他对人物的理解也很透彻。一开始，他对出去找演员的演职人员说：旺泉就要找张艺谋这样的，后来干脆就让张艺谋来演。张艺谋很能吃苦，每天和农民上山劳动，挑十几担水，还每天从山上背三块石板，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打石槽子。在拍旺泉和巧英被埋在井下那场戏时，他和梁玉瑾三天没吃饭，终于找到那种垂死时奄奄一息的感觉。

张艺谋当年曾跟吴天明开玩笑说：这该是我导演的东西，可惜叫你抢了先！”吴天明的回答是：我要借助你的锐气和冲击力，刺激和推动我前进。但是，最后我要吃掉你，把你的精华化为我的东西。”那时互相之间敢这样说这样的话，现在人哪敢？可见当时人与人之间真诚和信任，这就是将心比心。张艺谋曾说，他们这一代是在成熟时期受创痛，在苦难之后才成熟，苦难留给他们的痕迹是不同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也无所谓谁是正宗。两代人在一个战壕里作战，互相吸取、互相扬弃、互相竞争。张艺谋当初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里舍不得放走这么个人才。吴天明告诉他，叫他别为调动的的事情着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任何厂拍片。为了两人能再度合作，吴天明可以等他一辈子。

### 西影成了“中国新电影的摇篮”

长春电影制片厂被称作“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而西安电影制片厂则被称作“中国新电影的摇篮”。吴天明回忆说，西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异军突起是很有意义的案例。西影在1983年的时候，拷贝发行量居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高的10部影片中，西影一部也没有，而上座率最低的7部影片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西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生的许多故事，纷纷披着传奇色彩走上了银幕。《西线无战事》《老井》《黄土地》……一部部展现我国西部地区苍凉风貌、抒写独特人文故事的西部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段辉煌。以吴天明导演的《人生》肇始，一直被银幕所遗忘的“黄土地”成为“西部电影”的标志，而“西部电影”的崛起也直接造就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辉煌。

### 深受《海之歌》与崔嵬的影响

吴天明高中时就是文艺特长生，按他的话说“中了文艺的邪”。高二时他迷上了电影。那一年的冬天，他看了前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的影片《海之歌》，看了一遍，没有看懂，但是身上又没钱了，于是他就把脚上的新棉鞋脱下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店里面去卖，他告诉老板只要给他能看一场电影的钱就行。当时的电影票是2毛钱一张，老板给了他8毛钱，于是他直接就去买了两张电影票和一张影片说明书，而他自己坐在冰冷的电影院瑟瑟发抖，不得不将脚压在屁股下面坐着取暖。这部电影深深地吸引了吴天明，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魅力。吴天明强调，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引导了他的电影观。影片中那壮阔的伏尔加河、拦水坝，还有勇敢坚强的海的建设者……完全就是一部“诗电影”。因为看过十几遍，吴天明把片中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也正是因为他背过《海之歌》中的内心独白，帮助他后来考上了西影演员剧团训练班。他知道自己个子矮，相貌也一般，不可能做演员，就想怎么也要先挤进电影门，然后再改学导演。

在吴天明学电影的初期，有一位电影界前辈对他的影响很大，这就是被称作“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崔嵬。这真正是榜样力量。从崔嵬这里，他开始接触唐诗。吴天明印象最深的是讲到白居易被贬九江的

时候，元稹写的一首七绝：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滴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首诗的意境后来被吴天明用到了《人生》的片头中。1975年吴天明在北影《红雨》摄制组跟崔嵬学习导演。吴天明回忆，崔嵬身材高大、颇有气势。记得当年他访问苏联时，那达尔克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听说你是中国的邦达尔丘克！”崔嵬导演立刻回敬了一句：听说你是苏联的崔嵬！”他身上的那种不卑不亢、大很大爱的气魄令人很是钦佩。

### 首战失利决定向“虚假”开刀

1981年的影片《亲缘》是吴天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剧本讲的是台湾侨胞的思乡之情，而那时的吴天明连大海都没见过，这完全是个陌生的题材。吴天明说，不可否认，当时特别急于当导演，有点“投机”性质。当时在西影没人拿他这个年轻导演当回事，主创在现场敢跟他叫板，甚至有人伸出小拇指说：你知道你是谁？你是西影厂导演里的这个！”结果《亲缘》拍砸了，吴天明说他自己都不愿再看第二遍。吴天明批评这部片子在国产片中虚假和造作的程度即使不是登峰造极，能与之“媲美”的恐怕也不会多。

拍摄于1983年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改编自叶蔚林的小说。当时这部小说非常受欢迎，有几家电影厂都在争它的改编权。吴天明说，当时自己什么都不懂，第一部片子又拍砸了，但是他对这部小说特别心动，决定拿下这部片子自己拍。当时吴天明在京西宾馆对叶蔚林激情澎湃地说了很多想法，而且摆出自信满满的样子，使得他当场拍板把刚改好的电影剧本给了吴天明。后来吴天明经常跟人开玩笑说：别看我个子不高，黑不溜秋的，但还是有很大魅力。”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开始，他下决心要向电影中的虚假开刀。执导这部影片让吴天明学到了很多，从做电影到做人

影响着以后的人生。他始终强调，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真实，而真实应该是电影的第一个台阶。吴天明说，美国好莱坞的很多大片，把胡编乱造的剧本拍得令人信以为真，而中国的电影总是把真的拍得跟假的一样。所以真实是吴天明拍电影的第一诉求。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到《人生》、《老井》，这三部影片逐渐达到了吴天明对电影真实的探索。

### “将心比心”的真诚合作

《没有航标的河流》的成功为吴天明拍《人生》做了很好的铺垫。当初读路遥的原著《人生》时，吴天明激动得无法抑制，后来和路遥见面，两人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当时那种呐喊的愿望特别强烈。”吴天明形象地说：当地的农民从没有见过外面的

世界，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说：修理一辈子地球，终于往阳坡上一埋就算了！”听后真令我又辛酸又心痛。”但吴天明认为《人生》的硬伤也正在于后半部分城市的戏比较苍白；因为自己对城市的感情远远不如对农村深，所以很多主观的偏向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可能是太爱影片中的那些人了，尤其对于里面的吴玉芳扮演的“巧珍”过于偏爱。当时他甚至说过：娶老婆就要娶巧珍这样的”话。吴天明一直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他还是他自己，如同当年他不可能变成陈凯歌去拍《黄土地》，不可能变成黄健中去拍《良家妇女》，他的观念更新是建立在《人生》的基础上的。

《没有航标的河流》中的盘老五《人生》中的巧珍、高加林、德顺爷爷对于吴天明来说情同父女兄妹。他说《老井》中的孙

几年是我渴求知识、充实自己的一段旅程。我当时想的是，学成了可以投身制作环节，在影片中完成自己的理念。”

1991年，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张瑜，带着“可以驾驭一个摄制组的能力”开始闯荡台湾。在台湾发展的三年时间，她被称为“双料影后”，厂里舍不得放走这么个人才。吴天明告诉他，叫他别为调动的的事情着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任何厂拍片。为了两人能再度合作，吴天明可以等他一辈子。

张瑜：从80年代电影新人到80后学子知音



电影《阳光》剧照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在好友的安慰和鼓励下，张瑜重新振作。1996年，她再次拍摄“太阳系列”作品——《太阳火》。在这部影片中，张瑜不仅是制片人、主演，而且还担任了导演的角色。这部影片为张瑜重新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好评，也让她找回了自信。

事隔多年，总结《太阳有耳》投资的失败，张瑜面色淡定：世界上没有无本的生意，当初我还是电影市场的门外汉，怎么可能做到市场、口碑双赢呢！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部影片也为我今后的事业铺开了一条路，我开始学会怎么融资、怎么谈判、怎么闯荡市场。”

张瑜在业界有个外号，叫“张大胆”，这个叫法其实是外来历的。在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之际，《鲁迅》成为一部令业界自豪、欣慰的影片。影片中，张瑜除了饰演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还为影片的融资、制作、推广倾尽心血。《鲁迅》是中国多少代电影人想搬上银幕的作品，老艺术家赵丹、焦晃都曾

# 主旋律将我点燃

一个诞生于改革时代的文艺口号对我的影响

● 王兴东

“主旋律”第一次近距离将我点燃，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个炎热的夏天。1987年8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的陪同下，与长影的创作干部座谈。当他知道长影正在创作反映第一汽车制造厂“换型改造”的电影《解放》和表现石油工人海上钻井的《男儿要远行》时，非常激动地说：《解放》《男儿要远行》这都很好，因为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兴旺，必须有一种反映时代的、能够凝聚千万人的精神力量，得有精神支柱。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这样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实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看到反映我们时代的、鼓舞我们人民的、能够把十亿人民凝聚起来的作品。”

主旋律像一盏灯，顿时照亮了我案头的剧本《解放》。当一汽遭遇市场冲击，26000辆汽车卖不出去，7亿资金不能流通时，一汽陷入30年来最困难的境地。面对竞争危机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汽在中国北部摆下了决定命运的换型改造“大决战”，与发达国家争市场、比才智，十里车城吹响改革的汽笛。我迅速投入一汽，在沸腾的车间、在攻关的研究所、在忙碌的厂部，我都被一汽人改革的激情所感染。我在《解放》剧本里刻画出主人公知难而进的改革意志，塑造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

记得在党的十三大会议期间，胡启立同志还向长影厂的十三大代表赵实同志问起《解放》电影拍摄进展情况。后来，这部影片在国有企业职工中反响强烈，获得了国家的政府奖。

主旋律像灯塔一样，从此照耀着我的编剧航向。为追求能够凝聚千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用一年时间创作《蒋筑英》剧本，采访了60多人，深深地被中年科学家蒋筑英一根蜡烛两头点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蒋筑英的形象走上了银幕，他弹奏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主调，影响了无数观众。这部电影获得政府华表奖最佳影片奖，我也因此获得了华表奖和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为表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我投身到长白山山区农村，通过写干部下乡扶贫，改造了一个官僚，重塑了一个公仆”的故事，弥合了干群之间的裂痕。《留村察看》受到了农民观众的喜欢。紧接着参加《孔繁森》的电影创作，在反腐倡廉的呼声中，观众把拥戴人民好干部的目光投向阿里高原的孔繁森。

“主旋律”是改革时代的口号，由中国电影界率先打出，经过创作的实践和群众的检验，成为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代名词，对建设中国特色先进文化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和强大号召力。特别是1996年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了精品战略工程，对于反映时代主旋律，要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我更加

意识到主旋律不仅是社会责任，而且要求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

主旋律首先要符合艺术规律，更要适应市场规律。《离开雷锋的日子》是我在全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之际的剧作。这部电影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专家满意、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体现并凝聚了千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仅在北京就有185万人次走进影院，至今依然保持北京市最高上座人次纪录。我们是人口大国，观众是多层面的，审美需求必然多样，主旋律电影自有属于它的市场份额。

我在创作主旋律，主旋律也在改造我。面对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不想再走深入生活的老路。然而，主旋律的创作没有妙法灵招，没有捷径后门，只有与时代同步，到群众中去，贴近生活，才能感受社会的变化，倾听大众的心声，才能捕捉时代的旋律。创作的源头活水在基层。当我走进少年犯管教所，看到那么多的独生子女犯罪坐监，一位从事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法官妈妈”出现在我面前，她就是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的女法官尚秀云。为创作《法官妈妈》，我跟她办案，随她家访。《法官妈妈》走上银幕，在校园，在家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电影交流中，中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先进法理观念，赢得了普遍称赞；我去新疆、到延边，创作一个救助烈士遗孤的故事，电影《良心》将新疆与延边以民族团结之情连在一起，这个感人泪下的故事，仅在上海票房就创下407万元；我去内蒙编剧的《生死牛玉儒》，广东省电影公司用28万买下版权，发行收入500多万元。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这部电影直接发挥了作用。由群众投票评选为大众电影百花奖《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再现刘长春单刀赴会的故事，在北京奥运期间，76年前为中国敲开奥运大门的刘长春复活在银幕上，历史的足迹和今天民族复兴的脚步叠印在一起，成为能够凝聚千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激荡着每个中国人的民族情怀。

在坚持主旋律的创作中，我付出艰辛，也让我尝到莫大的甜头。这甜头不是获得两次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也不是多次得到“五个工程”奖，而是我的社会责任感收获了社会效果，那就是观众对影片由衷的感动。在人大附中读高三的学生肖迪，他的妈妈花240元在广安门影院买了《生死牛玉儒》一个晚场的票，由父母、外公、外婆等人陪着他观看。在当下人们面对多元化消费的娱乐大潮中，竟然有一家12口人，陪高考的学生走进影院去瞻仰一个高尚的灵魂。后来这个学生考进了北大，我为之感动、为之欣慰。至今，我铭记影评家肖尔斯的话：即便《蒋筑英》电影只有一个人看，也比那些打打杀杀的影片拥有众多观众更有价值。岳母只给岳飞一个人刻上“精忠报国”，岳飞却带起了千军万马。从长远意义上讲，一部电影的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当下国门开放，各种文化涌来，刺激的、麻痹的、消沉的，特别是一些带有娱乐色彩的精神摇头丸”，不断地渗透在青少年间，麻醉人民的理想，消磨人们的意志。我们无法禁止各种各样的花儿盛开，各种鸟儿的鸣叫，但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作家清楚地知道，百花齐放，牡丹为魁；百鸟争鸣，凤凰领唱。主旋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柱。

我无法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影在竞争中的发展的全貌，只能从一个时代的口号对我一个编剧的影响，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中，以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的艺术境界，纠正那些歧视主旋律是“政治的传声筒”的偏见。从1987年编剧《解放》始，到《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留村察看》《陆军见习官》《我死三次泪》《良心》《共和国之旅》《法官妈妈》《生死牛玉儒》《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一个个个人物形象排列在银幕上，将组合出我对这个时代的深情写照。

我身处改革年代，感受了时代的温度。一个向前发展奋争的民族，需要进步的鼓声，需要照亮心灵的阳光，需要能够凝聚千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主旋律像灯塔一样，依然照耀着我剧作的航向。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剧照